

戰爭、日常生活和近代中國——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黎志剛 袁子賢 楊彥哲
昆士蘭大學歷史系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於2013年10月15日至19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召開，旨在探討戰爭對近代中國所產生的影響。這次會議彙集了來自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和加拿大的學者，圍繞着近代中國的衝突這一主題，進行對比和討論。從地理上，關注從中國的西北邊境，到東北、黃海、日本，以及重慶等地區。就時間跨度而言，會議內容涵蓋從19世紀晚期到21世紀，話題廣泛，包括戰術學，戰爭回憶、版畫以至微博、軍閥與社會轉型、戰時之商業與外交以及戰爭對士兵的影響等議題。這種多樣性的議題展示了本次會議的主題：戰爭不僅僅局限於戰鬥——它包含了社會的各個方面，並且在戰爭結束後，仍然持續長時間影響社會。與會學者圍繞着「戰爭的社會影響」這一主題，就學界關注的論題進行討論。例如，戰爭是如何控制與影響社會？在文教活動、媒體建設和政治的權宜中，衝突是如何發生？主要觀點是：戰爭是一種社會問題嗎？正如會議召集人昆士蘭大學歷史系黎志剛（Chi Kong Lai）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James Flath所言，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並不單存在於戰爭進行的過程之中，這種影響往往延續至戰後並且遍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由此，通過戰爭及其衍生物這一視角作為切入點，將有利於加深我們對於近代中國乃至當代中國所形成的種種格局和現狀的理解。

綜言之，本次會議為戰爭研究提供了更多樣化的學術取徑，以不同議題，讓我們重新審視戰爭與社會之關係。從這一框架不難看出，本次研討會有如下幾個特點：

1、為中國近代戰爭史的研究發掘新的歷史材料及敘事方法——如西方的記錄及親歷者個人的回憶視角等；

2、關注「網路戰爭」這一種隨着近年通訊技術的發展而逐漸在虛擬領域出現的全新的戰爭模式及其影響；

3、探討戰爭對於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影響；

4、通過商業、外交及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觀察戰爭；

5、考察戰爭對於其參與主體——即士兵——所產生的影響。

本文對本次研討會各場次的演講及討論分別作一簡單回顧。

學術會議前，主辦單位有兩個重要的公開活動，分別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鄭秀強（Victor Shiu Chiang Cheng）的專題講座——「重慶和談：重新審視」，以及昆士蘭大學歷史系學生讀書會小組的專題報告。兩場學術活動，皆從新的研究取徑，關注過去戰爭史研究較少觸及的面向，探討戰爭在各種議題上的影響，提供不同的詮釋觀點。

以往，有部份學者認為重慶談判雖然是一起轟動一時的歷史事件，但其實質意義與其知名度及歷史地位並不對稱，其談判過程也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麼有趣。¹最近，部份學者更認為，在戰後中國的政治、軍事等各種條件的限制之下，戰爭才是當時歷史發展的「主旋律」，²和談只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已。³鄭秀強首先將時間場景拉回1945年9月重慶會談的現場，通過整理雙方軍事資本與佈局的相關史料，並結合談判心理學的視角，探討國、共兩黨談判人及美國調停人在短短六周的談判中，對中國戰後的和平進程所作出的努力。透過對重慶談判中各方使用過的談判以及調停技巧的分析，看到的是談判並不光是一個博弈過程那麼簡單。在和平談判中，最為重要的是

如何協調各方不同的觀點和利益。在更多的情況下，作出談判妥協的氣量，要比從事可怕與危險的軍事賭博的匹夫之勇更可貴。透過重慶談判的歷史，可以看到的是人們之所以珍惜和平，恰恰是因為它脆弱的本質。重慶談判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永久的和平，但國、共雙方在談判過程中所提出過的各種妥協方案，實際上是對後來的國共內戰提出了一個，現今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要面對的血淚控訴：戰爭，並不是當時國、共雙方的唯一選擇！這一場以軍隊增減為目的的談判，充分展現國、共領導者不同的思維，以及國內、外各方權力的交互關係。

延續「晚清與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國際學術會議的傳統，⁴ 昆士蘭大學歷史系學生在本次會議中，針對2013年出版的戰爭研究最新論著，與民國戰爭史學術作品，進行深度討論。這幾本重要著作，或提供新的研究取徑、或使用新史料，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戰爭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首先，Joshua Lovett以*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⁵一書，從軍人日記，理解國家和個人的戰爭論述如何相互交織，Lovett認為本書借用Michel Foucault的權力理論，以日記進行文本分析，說明我們重新書寫戰爭時期軍人的集體傳記。*Writing War*提供如何使用個人史料，理解戰爭中的集體記憶與經驗；而*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⁶一書，則從庶民視角，觀看太平天國的興衰，對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報告者袁子賢（Chris Yuan）認為*What Remains*採用《庚辛泣杭錄》的文學作品，說明太平天國時期，人們如何生活於兩個國家體制之下；並透過《兩江採訪忠義傳錄》的報導，探討太平天國覆亡後，戰爭對人們精神與生活上的影響，以及國家、百姓對戰爭記憶的建構。袁子賢肯定該書能幫助我們從庶民觀點，重新認識太平天國的戰爭日常生活史，此外，袁子賢亦建議未來亦可藉用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考察，從碑刻、族譜與宗教儀式中，獲得更多文本以外的史料。吳曉璐（Xiaolu Wu）報告*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⁷一書，將目光轉移到戰爭史研究較少關注的婦女群體，以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的婦女為研究對象，透過口述歷史，重新賦予女性在戰爭史中的話語權。吳認為本書訪問的婦女，背景多元，從她們的回憶講述中，能幫助我們發現群體對戰爭記憶的共性與差異。Adrian Raftery在*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⁸一書報告中，從國民黨軍隊建置的時空背景談起，並就軍隊本身與國家政策兩個維度，討論戰爭時期民族主義興起與社會流動概況。評論人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粟明鮮（Mingxian Su）認為，這幾本2013年的新著，各自提供不同研究取徑，將戰爭研究從宏觀視角，移轉至微觀的個人與社會群體身上，重新理解戰爭對社會與個人的影響。鄭秀強肯定這幾本新著的學術貢獻，反映戰爭史研究的學術轉向。James Flath強調，讀書報告中討論的著作，採用不同的史料與取徑，圍繞戰爭的影響與日常生活，恰恰呼應本次國際學術會議的兩大主軸，成功拉開會議的序幕。

會議首場的主題演講相當精采。在演講開始前，昆士蘭大學歷史、哲學、宗教與古典學院（School of History,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lassics,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院長Martin Crotty發表了簡短的引言，將澳大利亞戰爭史學界對戰爭回憶的研究與中國同行的研究狀況進行了比對和分享。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演講由香港浸會大學麥勁生（K.S. Ricardo Mak）的〈黃海海戰的幾個主要問題：關於漢娜根報告（1854-1929）〉，以及日本愛知文教大學吳嘉寶（Ka Po Ng）的〈中國的不安全性和國家發展〉兩篇論文組成。兩位主講者以新史料與國際關係的視角，跨越區域的困限，帶領我們重新反省戰爭的當代意義與研究趨勢。北洋水師是清朝建立的近代海洋艦隊，其規模與建制堪稱亞洲第一，但在1894年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卻輸給日本的聯合艦隊，自此，日本海軍掌握黃海海域的制海權。過去對甲午戰爭的研究，學者多使用中國與日本的官方史料，瞭解黃海海戰的勝敗原因與雙方的策略。麥勁生的專題演講，直指黃海海戰的重要問題在於戰術上的決策，試圖進一步探討是誰決定改變北洋艦隊的陣型。麥教授採取以往較

少見到的西方史料，時任李鴻章的海軍顧問，德國退伍軍官漢娜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4-1925）的報告，進行史料爬梳；並透過丁汝昌的報告與戚其章描繪的飛橋會議，幫我們從漢娜根的視角，回到黃海海戰的現場，去看傳統史料中沒有書寫的部份。事實上，麥勁生的專題演講以漢娜根的報告為切入點，為黃海海戰的研究提供一新視角，目的並不在於追究是誰下的決策指令，而是示範如何透過新史料，讓我們重新看見歷史事件的新圖像。他指出新材料的發掘，尤其是近代以來西方在華活動者的相關記述材料，將有助我們發現新的歷史線索，乃至填補過去相關研究中由於缺乏史料導致的空白。吳嘉寶以〈中國的不安全性和國家發展〉為題，指出在不同年代的經歷、環境、意識形態等因素下，自毛澤東以來包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至習近平這五屆中國領導層如何看待戰爭這概念，由此分析戰爭及地緣政治所帶來的安全隱患對於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評論人昆士蘭大學德國史專家Andrew Bonnell針對麥勁生的演講，由德國學術界對全球史的發展和世界戰爭歷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強調通過研究本國與外部力量的互動，來考察本國的相關歷史事件，是一個值得留意的視角。Bonnell認為未來研究中國近代戰爭史，也可從國際關係的視角去理解。本場演講的另一位評論人邱垂亮針對吳嘉寶的演講，指出要瞭解中國的國防思想，及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縈繞在領導人腦海中的不安全感，應當將觀察視角進一步向前推移至秦始皇的帝國時代，而不僅僅局限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國。此外，除了來自外部威脅之外，來自中國內部的不穩定因素也將是中國所面臨的安全隱患，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昆士蘭大學孔子學院講座活動中，澳洲格里菲斯大學馬克林（Colin Mackerras）從豐富的西方媒體、學術論著、電影、網路社群媒體和一般民眾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和觀感，探討中國形象與發展的轉移。馬克林引用Martin Jacques⁹和Susan Shirk¹⁰的著作，認為中國崛起對世界經濟是有正面影響；反之Troy Parfitt¹¹則認為中國仍處於兩個極

端化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尚有待觀察。但是，近年來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經濟與貿易合作夥伴。馬克林總結西方的觀點，認為中國崛起已是發生中的事實，她的強勢必挑戰西方霸權。馬克林分享自身在中國旅遊與生活的經驗，提供刻板印象以外的中國，告訴我們中國已經慢慢在改變，我們必須打破既往的迷思。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會議中發表的學術論文，有以下特色：

1、新史料和新方法的運用

在「戰爭與回憶」的場次中，主講人為來自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Terrance Hayes及James Flath。Hayes的題目是《在大毛拉穆薩·塞蘭米的歷史寫作中的蒙兀兒斯坦的滅亡與中國可汗的力量》。Hayes依據維吾爾史學家大毛拉穆薩·塞蘭米（Molla Musa Sayrami）的作品*Tarihi Aminiya*中的記述，回顧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在新疆地區的穆斯林動亂及清政府對於新疆地區的管制。由於這一敘述出自當事的維吾爾族本族史家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別於漢族以及西方史學家的敘事方式。同樣是對於戰爭的回憶，James Flath的〈戰爭與流行文化：前傳〉則另闢蹊徑，通過幾幅年畫作品來探討民間的畫匠是如何認識戰爭，進而探討底層民眾對於戰爭的認識和回憶，其涵蓋的歷史時期包括第一次中日戰爭、義和團暴動及1920年代的軍閥混戰。Flath還闡釋了日軍及其他力量是如何通過年畫等流行於民間文化形式，來向民眾進行意識形態灌輸，並以此塑造自身的正面形象和對手的負面形象。Flath以圖像分析方法，試圖描繪當時庶民眼中的義和團與外國人形象，甚至指出畫中日本人具有西方形象的問題，顯然當時中國百姓的國籍與地域概念是相當模糊的；但另一方面，庶民美學作品卻是中國百姓與世界資訊接觸的唯一管道。評論人昆士蘭大學Melissa Curley認為兩篇文章都透過不同的敘事作品，理解戰爭記憶與國家的建構。昆士蘭大學古典學系的David Pritchard則強調文化總是在歷史的前端，我們在看國家與民族主義之際，必須瞭解文化的根本；他並進一步肯定兩位主講人使用不

同的史料去觀看歷史，Hayes的演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使用一份親歷這一事件的本族精英所創作的文藝作品。他指出，通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事件，Flath則使用流行文化去理解庶民眼中的戰爭記憶。因為文化與歷史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相關的文藝作品往往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同時代的人們對某一歷史事件的認知。綜言之，兩篇報告採用新史料和新方法，理解發生於19世紀的戰爭歷史，如何影響着中國的發展。

2、關注網路與虛擬戰爭

在「虛擬戰爭」這一場次的演講中，戰爭由近代真槍實彈的熱兵器戰場轉移至當前虛擬的網路環境。兩位演講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目前在中國地區已逐漸普及的新浪微博作為研究對象，圍繞一系列熱點事件及伴隨着微博的發展而衍生出的種種概念，對存在於微博這一虛擬平臺之上的戰爭，對中國政府及社會的影響進行了探討。

昆士蘭大學楊陽（Yang Yang）發表了題為〈今日中國的網路戰爭〉的演講，全面探究今日中國網路媒體的發展。楊陽認為微博是一個庶民發表言論的平臺，同時也扮演政府決策的風向球。與楊陽女士所持的觀點不同，來自昆士蘭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的王洋（Wilfred Yang Wang）認為微博已經具備推動政府決策的功能。他所發表的〈捍衛廣東話：微博與廣州地域身份認同〉，以2010年在廣州爆發的「保衛廣東話」運動為例，詳細闡述了事件的始末，並指出正是借助微博這一虛擬平臺，民眾才得以組織起來，形成輿論壓力並且逐漸發展為街頭運動，迫使政府最終放棄了「廢粵」的決策。本場評論人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研究網路議題專家Paul Turnbull指出，如今日益發達的網路社區及相關平臺對於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及實踐言論自由，和推動社會變革等方面確實發揮積極影響，他以近年來發生的墨西哥與埃及大遊行兩個例子闡釋了這一觀點，認為網路確實說明民眾對公眾議題的參與與討論，未來對網路的研究必須更着重於其社會功能與意義。

3、探討軍閥與社會轉型的關係

「軍閥與社會轉型」這一場次的演講主要探討作為戰爭的衍生物，同時也是戰爭主體之一的軍閥，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往中國學界對軍閥研究主要圍繞各派軍閥的派系鬥爭，而對軍閥評價也以負面居多，¹²而本場演講則嘗試為學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來考察這一問題：一方面主講人將研究重點由戰場轉向軍閥在社會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嘗試撇除成見，以一種客觀立場重新對軍閥進行評價。

粟明鮮的講題為〈桂系軍閥與1936年「六一運動」〉。在該演講中，他圍繞「六一運動」這一歷史事件，從地方社會發展的視角，以廣西省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層面的建設，闡釋了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軍閥，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在對日鬥爭策略上的衝突，以及他們作為地方勢力，與蔣介石的中央勢力之間的權力鬥爭。粟明鮮認為，1937年左右，中國出現的「表面上的統一局面」及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與桂系等地方軍閥的活動有着密切的關係。評論人鄭秀強從事件中各派系公開言論、宣傳品和相關謠言，及日本公開桂系從日方購買軍火的動機，來還原這一事件在各方想像和解釋上的真實性問題與粟明鮮討論。

關於韓復榘對山東省鄉村建設運動所產生的影響這一課題，在過去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以致缺乏相關的專題研究。不少討論韓復榘在主政山東時期所推行的經濟社會建設的論文，亦鮮有提及韓氏與鄉村建設運動之間的關聯。¹³即便部份學者曾經嘗試撰寫關於韓復榘與鄉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梁漱溟之間的互動，對於韓氏是如何支持鄉村建設者實施其鄉村改造計劃以及對山東的鄉村建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仍缺乏清晰的脈絡，同時在對韓復榘評價方面，仍難以擺脫以往對軍閥這一群體進行負面的評價。¹⁴在本場演講中，昆士蘭大學歷史系楊彥哲（Yan Zhe Yang）所發表的〈軍閥與鄉村建設：以鄒平為例（1931-1937）〉一文，幫助我們省思今日現代化建設所衍生的諸多問題。該報告以1931年至1937

年在山東省鄒平縣所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為例，通過軍閥韓復榘與梁漱溟之間的互動，探討軍閥在推動鄉村變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同時，楊彥哲指出鄉建派與軍閥的合作，以及此後國民政府對鄉村建設運動態度的轉變，也可視為中央與地方各派軍閥勢力相互競爭的結果，而這一競爭亦可視作1920年代軍閥混戰的延續。

香港浸會大學鄭智文（Chi Man Kwong）表示，楊彥哲所作之報告清楚地回顧了軍閥與鄉村建設者之間的合作，同時把鄉建派這一獨立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第三股改造社會的力量引入了我們的視野。不過也正如該報告中指出，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有賴更多相關材料——尤其是統計資料——的補充，方能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結論。

4、回顧戰時的商業與外交

研究抗戰大後方企業發展的張守廣教授，曾言：「西南企業家在抗戰時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盧作孚曾經發揮了其他任何企業家無法替代的重要地位。」¹⁵ 在「商業與外交」的場次中，黎志剛在〈戰爭對盧作孚與民生公司在戰時重慶商業活動的影響1938-1945〉一文中引用《嘉陵江日報》、《民生公司簡訊》、《新世界》、《北碚月刊》、《良友》等新的史料，加上黃立人主編的《盧作孚書信集》、各種版本的《盧作孚文集》和民生公司檔案，詳細介紹了盧作孚所領導的民生公司，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運作及戰時經營管理的問題，以及盧作孚本人如何運用非常手段，動員其公司力量為抗戰提供支持。針對戰時盧作孚在重慶地區的商業活動進行深刻討論，黎志剛首先從民生公司在抗戰初期，宜昌大撤退中如何保持大後方實力、民生公司和合資企業對大後方城市化的建置、北碚城市化等方面作一分析。黎志剛認為盧作孚的企業運作與理念，採取軍事的管理策略對重慶地區，特別是盧作孚控制的北碚，以及其控制的企業社區之軍事化城市文化有深遠影響。黎志剛進一步討論民生公司對大後方城鎮規劃，與文化思想上造成的衝擊和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討論。吳曉璐於〈衛生、制服與認同：戰時重慶的日常生活〉一文，

通過衛生、消費、制服等社會經濟文化層面，探討戰爭對重慶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吳曉璐以制服為出發點，通過考察公司、工廠女工、大學生等戰時服裝的要求與變化，來看戰時重慶民眾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方式之變化。評論人呂志偉則建議，對戰時日常生活的研究，未來可借用現代性「modernity」的理論進行分析。甘肅農業大學人文學院楊軍偉（Junwei Yang），在〈1930年代的日美關係與抗日戰爭的爆發〉一文中，則從外交層面，展示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及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美國與日本在遠東問題上的種種互動。楊軍偉認為，正是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中日戰爭問題上採取孤立外交政策，放任了日本的擴張，最終導致其開展全面侵華行動。在自由討論環節，鄭智文建議，在外交活動上的研究，未來也可以從史料中，更深刻的掌握當時的問題與狀況。鄭智文從技術層面就英美干涉日本侵華行動的可能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在彼種環境之下，由於補給線過長，而且尚未有合適的基地，英美幾乎不可能派遣主力艦隊進入東亞威懾日本。楊軍偉對此作出了回應，他認為早在鴉片戰爭時期，英美等西方列強的軍艦便已進入中國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巡航，因此他們完全有能力在東亞部署一定的軍事力量進行必要的干預。

5、描繪戰爭科技對士兵日常生活的影響

最後一場演講的主題為「戰爭對士兵的影響」，這一主題亦可算是本次研討會的最大特色所在，由鄭智文、袁子賢及Morris Low所作的三篇報告，將研究物件鎖定在武器裝備和日常生活這一通常為人所忽略的角落，以下層軍人的視角對戰爭進行解讀。

鄭智文的報告以〈詭秘戰術的代價：奉軍1919-1931〉為題，詳細介紹戰爭中的新科技，如何幫助地方軍閥進行現代化軍事活動的建制。鄭智文透過奉軍新式的科技在裝備、訓練、軍人的素質及戰略戰術上的現代化轉變，並分析了這些轉變為士兵、及當地社會，特別是奉系的經濟和外交所帶來的影響。鄭智文系統性的梳理奉軍在現代化武器與軍備上的發展，在奉軍從法國引進

新型號的大炮與飛機之後，武器的進步亦影響軍人的制服、營養與隊型，以及訓練。鄭引述豐富史料，並運用大量影片，讓我們看見奉軍在軍隊現代化方面的努力。過去，學術研究對張作霖的評價，多從政治層面去理解其與日本、國府的競合關係；但鄭智文認為，我們或許可以從奉軍現代化的軍需與地方關係，去理解張作霖的某些政治作為。評論人鄭秀強認為有三方面可作更深入的探討：一為武器現代化與軍事戰略、戰術現代化之間的落差；二為從更長的歷史脈絡和「地方文化」在軍事科技擴散過程中對奉軍軍事現代化所產生的作用；三為從奉軍與其他地方軍閥在軍隊現代化建置上的異同之處，以彰顯奉軍的特殊性。

袁子賢以一位國民黨軍人的日記為基礎，撰寫了〈抗戰時期國民黨軍人的日常生活〉一文，通過研讀這份珍貴的一手資料，嘗試還原抗戰時期國軍士兵這一群體在戰時的真實生活狀態。文中透過私藏的低階軍人日記與其他已出版的日記、文學作品與回憶錄，幫助我們理解抗戰時期國民黨軍人在兵源、軍需、補給、訓練與裝備上的匱乏，並從軍人的日常生活理解其飲食、生活、衛生、娛樂、男性環境，以及他們如何面對戰場的死亡經驗。評論人鄭秀強認為本篇文章必須再對國軍軍隊做明確的定義，並從政府的相關檔案中，探討政府如何應對與解決軍人的日常生活問題；亦建議袁子賢能更著重於軍隊在戰爭時期的犯罪問題來分析。而同樣來自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Morris Low在〈家庭、復員士兵與戰後日本的殘傷生活〉一文，則將研究物件從中國移轉到日本的普通士兵，Low透過電影與口述訪談，描述了戰後日本對於退伍及傷殘軍人的處置，聚焦於日本軍人在戰後如何回到家庭與社會，伴隨他們的戰爭經驗，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情緒、人生觀與回憶。此外，也討論了戰爭對於這些軍人的精神狀態及家庭關係所帶來的影響。Low將戰爭對軍人精神上的影響與衝擊，做了非常細緻的描述。但在研究史料上，必須思考電影呈現的文本是否受到某種意識型態的干預，而影響其真實性。評論人John Weik非常肯定Low的研究價值與意義，

Weik認為日本軍人在戰後承受的精神壓力非常沉重，軍人回到日本社會後，不僅要面對文化適應上的衝突，更挑戰他們強烈民族主義的價值理念。會議最後由格里菲斯大學旅遊孔子學院院長Leong Liew和會議召集人黎志剛進行總結。Liew表示這次會議開拓了學術界對戰爭史研究的視野，運用新史料、跨學科的領域，着重戰爭之於社會及個人影響的各個層次，甚具意義，也非常成功。

整體而言，「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緊扣「影響」和「日常生活」兩大命題，對戰史的研究範疇進行了拓展，與會者認為對戰爭的研究不應僅僅局限於戰場本身，戰爭的影響是多層面、持續性的。透過不同層次的研究，學者們從各個視角、運用各種新的史料、媒材，讓我們看見戰爭研究新的發展方向。由此，本次研討會的參與者從戰爭史領域的相關學者，跨越到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文化史等方面的專家，共同參與討論並發表他們的成果，這一舉措也大大豐富了本次研討會的內容，來自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與會者也由此得以享受跨學科交流所帶來的靈感與新思路。此外，本次研討會也為年輕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平臺，發表他們的新成果。本次研討會的部份論文將考慮在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期刊陸續發表。

註釋

- ¹ 如Oliver Edmund Clubb認為國共雙方在重慶和談中，並沒有任何進展。白修德（Theodore White）則以「一個沒有意義的宣告」，形容這場會談。鄧野以「這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值得被慶祝的階段」評論會談的歷史意義。
- ² 金沖及從毛澤東的文稿、電報、書信、講話紀錄和會議記錄中，探討共產黨在重慶和談中的策略與計劃。參考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楊奎松從《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的實質內容，探討國共雙方對和談的各自表述，以及蘇俄、美國在促成會談上扮演的關鍵角色。參考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

- 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頁255-296。汪朝光則就國共雙方的策略討論重慶會談的內容，以及其造成的社會與國際影響。詳見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27-52。
- ³ 有關的論點參見鄧野，〈論國共重慶談判的政治性質〉，《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頁30-64；汪朝光，〈戰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至政協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頁14-42。
- ⁴ 讀書會小組報告是昆士蘭大學歷史系主辦國際學術會議中的一項傳統，旨在透過最新論著，理解近年來研究的趨勢，與審視學術研討會的意義與價值。2012年5月23日至27日，於昆士蘭大學舉辦的「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國際學術會議中，讀書會小組就物質文化、性別研究、日常生活與文化史理論等主題的論著，進行專書報告，獲得與會者非常高的評價。
- ⁵ Aaron William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⁶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⁷ Danke Li,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英文本收錄20位婦女的故事，中文本則編入35位婦女的戰爭經驗，於2013年發行。李丹柯，〈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
- ⁸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3).
- ⁹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Allen Lane, 2009).
- ¹⁰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¹¹ Troy Parfitt, *Why China Will Never Rule the World: Travels in the Two Chinas* (Saint John, NB: Western Hemisphere, 2011).
- ¹² 陳志讓曾指出軍閥是阻礙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一大因素：「……內戰、重稅、對新興事業的摧殘，又把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延遲了三十年。」參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85-186。
- ¹³ 如董愛玲、宋懷芝等人關於韓復榘主魯期間山東省經濟建設的研究，儘管對韓氏在山東所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作了詳細的闡釋，卻並未提及韓氏支持並設立鄉村建設實驗區一事。參見董愛玲，〈試析韓復榘主魯時期的經濟發展及原因〉，《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1月，頁95-98；宋懷芝，〈韓復榘政府入魯初期的治魯計畫及實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增刊，頁70-74。
- ¹⁴ 如杜林、李先倫、李遠江等人的研究成果，儘管均論及韓復榘對鄉村建設的推動以及其與梁漱溟之間的互動，但仍缺乏系統性，在材料的彙集整理與敘事的條理性方面仍有改進的餘地。參見杜林，〈梁漱溟韓復榘的合作與衝突〉，《炎黃春秋》，2002年，第10期，頁66-69；李先倫，〈韓復榘支持梁漱溟鄉村建設原因探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頁128-131；李遠江，〈梁漱溟與山東縣政革新〉，《黨員幹部之友》，2010年，第1期，頁54-55。
- ¹⁵ 張守廣，《大變局——抗戰時期的後方企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19。